

中东地缘政治中的非阿拉伯因素

中土关系四十年：回顾与展望

丁 工

摘 要：中土两国有着悠久的交往史，尤其是 1971 年实现关系正常化以后，双边关系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尽管自建交以来，两国关系因受各种因素的影响，发展并不十分顺利，但总体上取得了较大进步。进入 21 世纪后，两国都步入崛起阶段，双方开始从战略的高度审视相互关系的走势。本文通过回顾中土关系的历史，梳理双边关系中存在的问题，进而展望未来双边关系的发展前景。

关键词：中土关系；外交战略；大国外交；回顾与展望；中国中东外交

作者简介：丁工，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国际政治专业 2009 级博士研究生（北京 100091）。

文章编号：1673-5161（2011）03-0020-09

中图分类号：D822

文献标识码：A

土耳其共和国位于欧亚结合部，国土总面积达 78 万平方公里，其中 97% 的领土在亚洲的小亚细亚半岛，3% 在欧洲的巴尔干半岛，是横跨欧亚两大洲的国家。土耳其是伊斯兰世界里的大国，拥有 7400 万人口，其中 99% 信奉伊斯兰教，国民生产总值达 6300 亿美元，居世界第 17 位。^[1]土耳其毗邻黑海、地中海和爱琴海，接近里海，并扼守博斯普鲁斯海峡和达达尼尔海峡两个咽喉通道，在地缘战略格局中占据独特的位置，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著名战略家布热津斯基在其力作《大棋局》中，将土耳其称作撬动欧亚大陆地缘战略的支轴国家。此外，在军事方面，土耳其拥有现役部队 63.9 万人，并大量装备西方制造的先进武器，是北约中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武装力量，其军事实力不仅在中东地区首屈一指，即使在欧洲也属于重要的军事强国。

自正义发展党上台执政后，土耳其政局趋于稳定，经济获得快速发展，迅猛的崛起势头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同时入选颇受瞩目的“展望五国（VISTA）”和“新钻十一国（Next-11）”两个最具发展潜力的新兴经济体榜单，发展前景看好。随着国力的持续提升，土耳其参与国际和地区事务的愿望更加强烈，在维护周边和平、推动地区繁荣、创设国际机制中的作用日益显现。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后，G20 成为最重要的国际多边机制，作为 G20 成员的土耳其直接参与到国际新机制的建设和全球治理的议程中，成为影响国际新秩序发展趋向的重要一员。因此，无论从发展的潜力还是现实的情况来看，土耳其都是值得中国重视的国家，中土关系的历史和未来都是值得我们认真研究的问题。

中土分居亚洲大陆东西两端，并都曾有过辉煌历史和灿烂文明。双方有着源远流长的交往史，中国瓷器技术与土耳其制陶技术的交流就是很好的明证^{[2]78,96}，至今土耳其托普卡帕宫里还收藏着大量中国明清时期的瓷器。新中国的建立为中土关系翻开了新的历史篇章，尤其是自两国 1971 年建交后，双方关系跨入了一个崭新的时期。2011 年恰逢中华人民共和国与土耳其共和国建交四十周年。回首中土关系四十年风雨历程，分析双边关系发展中的成果和问题，对于指导未来中土

关系的健康发展，合理规避可能出现的负面影响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

一、中土关系的历史回顾

（一）新中国成立前的中土关系

1. 古代的中土关系

土耳其人最早发源于中国新疆阿尔泰山到叶尼塞河上游一带，史称突厥，现在的土耳其人主要是 8~13 世纪时，部分突厥人的部落不断西迁至小亚细亚，并与当地各族居民相互融合形成的现代民族。公元 6 世纪，突厥人崛起于中国北方，极盛时期建立起一个囊括东至大兴安岭、西濒西海（今咸海）、北至北海（今贝加尔湖）、南临阿姆河南的地域辽阔、纵横万里的庞大突厥汗国，并一度成为同期中国中原各王朝最主要的威胁。但该国只是一个政治、经济、社会结构上组织松散的军事性部落联盟。^[3]公元 6 世纪末，该国便分裂为东突厥和西突厥两个汗国，并于公元 7 世纪先后被中国唐王朝所灭。此后，大部分突厥人迁入大唐境内，并逐渐融合进中国北方的民族中，而其残余部落则在随后几个世纪中沿着中亚走廊不断向西迁徙。因此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中土两国早在隋唐时期就有交往，只不过此时两国关系的实质是两个民族的交往，并主要通过战争形式来表现。

突厥部落西迁后，沿欧亚大陆腹地辗转来到小亚细亚半岛并最终定居此地。11 世纪时，突厥游牧部落中的一支“乌古思”侵入安纳托利亚，建立塞尔柱突厥王朝，并随王朝持续的武力扩张，安纳托利亚开始了突厥化和伊斯兰化进程。13~15 世纪，奥斯曼人夺取了西安纳托利亚和巴尔干的拜占廷领土，并定都君士坦丁堡（1453），建立起令现今的土耳其人无限敬仰的纵横欧、亚、非三大洲数百年的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帝国成立后积极对外扩张，曾多次挺进东欧中欧腹地，对东欧诸国形成巨大的压迫态势。到 16 世纪末，奥斯曼帝国处于鼎盛时期，其版图囊括西至巴尔干半岛、中欧的匈牙利大部分地区，东到幼发拉底河同伊朗的萨非王朝接壤，北至高加索山脉南麓，南抵北非及阿拉伯半岛大部分地区，成为横跨欧、亚、非三大洲的大帝国。土耳其奥斯曼帝国时期，正值中国的元、明、清三朝，同期的中土两大王朝国力强盛，雄踞亚洲大陆东西两端，分别是当时伊斯兰文明和东亚儒家文明的核心国家。双边的交往也在繁荣的贸易往来带动下全面发展，大批土耳其商人沿着古丝绸之路来华贸易，中国的瓷器就是在此期间大量进入土耳其境内的，并经土耳其地区传入欧洲。

2. 近代的中土关系

近代，中土两国同时遭遇到严重的民族危机，先后成为西方列强宰割、奴役的对象，两个民族分别被称为“东亚病夫”和“西亚病夫”，国势衰微、领土沦丧，整个民族面临灭顶之灾。为此，两个民族都开展了救亡图存运动，并通过革命结束了腐朽没落的封建王朝的统治，开启共和时代。1911 年中国爆发辛亥革命，推翻满清王朝的封建统治建立中华民国，1923 年土耳其在凯末尔的带领下成立共和国。土耳其共和国成立后积极主动与世界各国建立友好关系，并谋求与中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由于中国担心土耳其利用突厥血缘关系对新疆地区的穆斯林产生影响，妨碍地方管理，中土建交几经挫折，经历北洋政府、国民政府两届政府，最终于 1934 年正式建交。此后中土两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交往更加频繁。此外，自近代以来，中国与土耳其的社会发展经历非常相似，都被迫沦为西方列强的势力范围，都面临着突如其来的社会变革，使得两国民众之间存在着某种亲近感。^[4]当凯末尔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取得胜利后，极大地鼓舞了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斗争。国民政府的统帅蒋介石甚至视凯末尔将军为崇拜的偶像，将凯末尔的执政理念

运用到中国的治国之道中。

（二）新中国成立后的中土关系

1. 从敌对到建交（1949~1972年）

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1971年两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中土两国受冷战国际大背景的影响，双方一直处于相互敌对的状态。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之初，土耳其国内的许多报刊纷纷发表消息和社论予以祝贺，土耳其政府也准备立即同台湾当局“断交”，宣布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时任土耳其共和国总统的杰拉尔·拜亚尔在一次内阁会议上指出：“中国是一个潜在大国，应该和它发展关系。”^{[5]16}但由于此时正值中美关系紧张之际，土耳其采取追随美国的政策，加入封锁和绞杀新中国的西方阵营，并拒绝承认新中国，长期与台湾当局保持往来。朝鲜战争爆发后，土耳其指责中国是“侵略者”，甚至派出军队参加美国领导的所谓“联合国军”，与中国人民志愿军作战。因土耳其在朝鲜的优异表现，1952年北约正式接纳土耳其，土耳其开始执行一条彻头彻尾的亲西方的外交路线。此后，中土关系不断恶化，双方长期互不往来，处于敌对状态。中国政府不断谴责土耳其帝国主义走狗的政治路线，土耳其则基于朝鲜战争中对中国的认识把中国军人描写成邪恶之敌、可怜的战俘或者幼稚的共产主义信仰者。”^[6]

2. 建交后平稳发展（1972~1991年）

进入20世纪七十年代，在中美关系缓和的大背景下，中土关系大幅改善，1971年8月中土两国在巴黎签署建交公报。《公报》宣布，中土两国政府根据尊重独立、主权、领土完整、不干涉内政、权利平等和互利的原则，决定自即日起建立外交关系。土耳其政府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为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断绝与当局的“外交关系”。台湾驻安卡拉“使馆”降格为“经济与文化代表处”，驻伊斯坦布尔“领馆”降格为“商贸办事处”，至此中土关系结束对抗状态，实现正常化。^[7]随后1971年9~10月，土耳其在26届联大上对恢复中国合法席位的2758号决议投了赞成票，对美日“重要问题”提案投了弃权票。1972年4月，中土两国互设大使，土耳其宣布断绝与台湾的“正式外交”关系。^{[8]34-40}建交后双方在政治、经济、文化、科技、贸易等方面的交流与合作有了长足发展，中土关系进入逐渐增加彼此了解、探索实质性合作的阶段。

1974年，土耳其外长图兰·居内什率团访华，同中方签署中土贸易协定。此后，两国间又相继签署了《鼓励和相互保护投资协定》、《避免双重征税和防止偷税协定》、《海运协定》。1978年6月，黄华外长率团访问土耳其，这是中土建交以来新中国外长第一次踏上土耳其这块陌生的土地，属于“拓荒之旅”。黄华外长与时任土耳其总理埃杰维特亲切会见，并与外长厄克钦就发展双边经贸关系举行会谈。在会谈中，黄华外长高度评价土耳其人民几个世纪以来同西方殖民者进行的英勇抗争以及土政府在捍卫政治独立和国家建设方面所取得的成就，称赞土耳其人民具有光荣的斗争传统。厄克钦外长表示中国在亚洲和世界政治中发挥了巨大作用，土耳其高度重视发展同中国的关系。访土期间，黄华外长向土耳其国父凯末尔的陵墓敬献了花圈，令土方深受感动。^[9]

进入八十年代，随着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推进，中土双方交往增多，高层互访频繁，关系发展较快。1982年12月土耳其总统埃夫伦访华，这是土耳其共和国建立以来土国家元首第一次访华，受到邓小平同志和胡耀邦总书记的亲切会见。随后中土双边高层互访进入一个高潮期，1984年3月中国国家主席李先念访土作为对埃夫伦访华的回访，1985年7月厄扎尔总理访华，紧接着1986年7月赵紫阳总理访土。在一系列高层互访的推动下，中土关系迅速升温，两国建立了不定期政治磋商机制，巩固了联合防苏这一战略默契，还就不同问题达成了多项双边协定。1989年北京发生政治风波后，土耳其采取不同于西方的立场，反对干涉中国内政，并呼吁解除对华制裁。从建交到冷战结束的20年间，中国与土耳其的关系虽取得积极进展，但从各方面来说两国关系仅

处于正常和较平淡状态，双边关系仍然受制于冷战的格局。一方面，中国改革开放时期，外交工作的重点是从西方发达国家获取资金和技术；而土耳其方面的外交重点是维护与美国的盟友关系，发展与欧洲国家的经贸关系，中土关系的进展很大程度上受到中国同西方国家关系的影响。八十年代中期中土关系之所以出现一个小高潮，一方面是因为中土两国共同面临来自苏联扩张的威胁，双方相互协作从苏联的东部和南部边界共同牵制苏联；另一方面，当时中国与欧美国家处于“相对蜜月期”，也为中土关系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国际背景。因此，这一时期中土关系仍然无法摆脱冷战阴影，两国重视发展双边政治关系，而把发展经济关系的重点放在发达国家方面。从而使这一时期中土双边关系表现出政治关系发展较快、经济关系发展缓慢的基本特点。

3. 后冷战时期全面发展（1991~2002年）

冷战结束为中土关系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历史契机，但20世纪九十年代初期，西方国家因北京政治风波同中国的冰冻关系还未完全消融，而土耳其仍然将西方外交作为外交工作的重中之重，注重在国际事务中与欧美保持一致，因此对发展对华关系不太积极。到九十年代中期，土耳其看到中国不但没有在西方压力下崩溃，国力却蒸蒸日上，国际影响力不断扩大，对中国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开始改变以前较为轻视中国的政策，提升对华外交在其外交布局中的份量。此阶段双方政治关系发展顺利，高层互访增多，先后有1995年5月德米雷尔总统访华，1996年11月乔石委员长访土，1998年5月埃杰维特总理访华，1999年4月李鹏委员长访土，2000年国家主席江泽民、2001年政协主席李瑞环、2002年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对土耳其的访问以及2002年阿克布卢特议长访华等。良好的政治气氛有力地推动双边经济关系的发展，而两国政府也有意将发展经贸关系放在重要的位置，这一时期经贸发展是双边关系中的一大亮点。据中国商务部统计，截至2002年底，土耳其对华投资签约项目数68个，合同外资金额5405万美元，实际投入1812万美元。中国公司在土承揽承包劳务项目累计合同金额1.617亿美元，其中完成金额5538万美元。^[10]

4. 新世纪的中土关系（2002年至今）

2002年正义与发展党上台执政后，结束了此前土政局动荡的局面，土耳其经济步入快速发展的快车道。随着综合国力的持续提升，土耳其的大国和自主意识迅速增强，对外政策不再盲目追随西方。面对21世纪不断变化的国际形势和以中国等新兴大国崛起的客观事实，土耳其政府积极调整外交政策以尽快适应新的国际环境。对于中国的崛起，土耳其各界达成一个共同的想法，即中国是一个在世界政治领域中日益增加和扩展其影响的力量，是有希望改变美国主导的世界秩序版图的国家。土耳其观察家哈斯雷特·乔马克曾说过：“提升与这个到2025年有望成为一个超级大国的国家合作，并提供新的合作机遇，对土耳其来说是不可缺少的。”^[11]近年中土两国高层互访频繁，政治互信增强，经贸合作快速发展。2009年6月土耳其总统居尔访华，与胡锦涛主席举行了会谈，并分别会见吴邦国委员长和温家宝总理。^[12]居尔访华期间，中土双方签署涵盖外交、能源、文化、传媒、贸易等领域的七个政府间合作文件，以及涉及基础设施、电力、矿产、农产品进出口等领域的六个企业间合作协议。居尔还出席了中国—土耳其经贸论坛，并应邀在新疆大学发表演讲，并被授予名誉教授称号，回国后居尔总统高度评价此次中国之行。2010年10月温家宝总理访问土耳其，并分别与居尔总统和埃尔多安总理举行了友好、坦诚、务实的会谈。会谈后双方宣布建立和发展中土战略合作关系，全面提升各领域友好合作水平。双方还决定全力办好2012年在土耳其举办的“中国文化年”和2013年在中国举办的“土耳其文化年”活动，并表示努力使2015年的双边贸易额提高到500亿美元。^[13]此外，2010年9月中国空军首度参加了在土耳其举行的代号为“安纳托利亚之鹰”的联合军演，有评论认为，该项演习此前主要由和土耳其同属北约的国家参加，本次邀请中国空军参演可见土耳其扩展与中国在安全防务领域合作的愿望，

也标志着双方的政治互信进入一个新的高度。

二、中土关系存在的问题

经过两国政府几十年的共同努力，中土关系取得了重大进展，尤其在近年更是飞速发展，双方合作的范围也由以前主要集中在政治和经贸领域扩展到文化领域。土耳其政府计划在一些高中教授中文，每年派 15~20 名土耳其学生到中国学习。中国也在土耳其建立了两所孔子学院，为土耳其学生提供中文教学和全方位了解中国的机会。中土两国政府在建立和发展战略合作关系的目标指引下，全面提升各领域的友好合作水平，但双边关系中存在着一些敏感问题，并成为限制甚至破坏中土关系健康发展的潜在威胁。目前，影响中土关系的主要因素是经济摩擦问题、东突问题以及地缘竞争问题。

(一) 经济摩擦问题。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对外贸易量不断扩大，中土贸易额也不断提升，但同时双方贸易摩擦和争端的数量也急剧增加。近年来，土耳其已成为对中国商品进行反倾销调查最多的国家之一。造成中土经济摩擦的原因主要来自经济结构趋同和贸易不平衡两个方面。中土都是发展中国家，在产业结构上相似度较高，导致目标出口市场重叠，出口产品互补性较小，竞争性却很强。纺织和服装产品是土耳其主打的出口品，并且以欧洲、中东为核心出口市场，而这两种产品也恰好是中国的重要外贸商品，并且在欧洲和中东地区拥有较高的市场占有率。随着近年中国纺织品在欧洲、中东地区市场份额的持续增大，土耳其相关产业部门更深切地感受到中国商品带来的竞争压力。土耳其的研究机构认为，尽管土耳其与欧洲之间的距离非常近，土耳其的纺织品还是无法同中国在欧洲市场上进行竞争，因为中国拥有更为低廉的成本优势和不断提高的科技水平。

中土经贸合作始于 1965 年，到 2008 年时双边贸易额已达到 126 亿美元，中国成为土耳其最重要的贸易伙伴。但在双边贸易稳步上升的背后，却是中方不断攀升的贸易顺差。1993 年时，中国对土耳其的出口额徘徊在约 2500 万美元，是当年土耳其对中国出口额的一半。然而到 2006 年，中国对土耳其的出口额增加到 96.57 亿美元，出现近 90 亿美元的贸易顺差。2008 年，这一数字又增加了 18%，增至 156.58 亿美元，是土耳其对中国出口额的近 11 倍，使得土耳其出现超过 142 亿美元的贸易逆差。自 2006 年以来，中国已成为位居俄罗斯和德国之后的第三大对土耳其出口国。巨额贸易逆差的出现使土耳其国内的贸易保护主义抬头，针对中国商品限制性措施和反倾销调查日渐增多。1995~2004 年，土耳其所发起的 89 件反倾销调查中，有 34 件是针对中国产品的。而此后，土方针对中方商品的贸易保护领域由原来传统的纺织品扩大到家电等高科技领域。目前中土经贸领域中存在的问题，已引起了双方政府的高度重视，虽然两国政府都以平常心，视之为正常的国际关系现象，并表示将共同采取有效措施，妥善应对。但也应看到，经济利益冲突已成为中土关系中客观存在的事实，如果处理不善，在某些特定条件下有可能会引发矛盾升级。

(二) “东突”问题。“东突”问题一直以来都是影响中土关系最棘手的问题，也是未来最有可能引发双方矛盾升级的因素。“东突”恐怖主义全称“东突厥斯坦伊斯兰主义”，是对境内外打着各种旗号，目的将新疆从中国领土分离出去的各种组织的统称。“东突”分裂主义不是具体的某个政党或组织，而是对从事新疆分裂运动的这一群体的概念性界定。“东突”分裂主义的极端形式是“东突”恐怖主义，其思想渊源便来自于“双泛”思潮——“泛伊斯兰主义”和“泛突厥主义”，目前“东突”恐怖主义已成为威胁我国国家安全和西部地区稳定的难题。

由于在血缘、语言、文化、宗教等方面土耳其与中国新疆的维族相近，土耳其国内部分势力

长期以来都是“东突”分裂势力的同情者。自20世纪初“东突”问题出现以来，土耳其一直都是“东突”分裂恐怖主义势力的大本营，并且“泛突厥主义”本身就发源于土耳其，可以说土耳其的东突厥政策对我国的“东突”分裂主义活动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土耳其纵容甚至庇护其境内的“东突”势力，是这一问题的症结所在。20世纪四十年代中期，一些老牌分裂分子伊敏、艾沙等大都移居土耳其，并得到了以泛突厥主义为基础的土历届政府的支持，土耳其总统厄扎尔甚至亲自会见了定居在土耳其的东突民族分裂分子艾沙·尤素福、阿尔普太金等人。部分土耳其高官甚至表示“在东突厥斯坦至少有数百万我们的兄弟在中国的压迫下，过着水深火热的生活”。土政府还帮助设立了“东突厥斯坦慈善基金会”，用于资助东突分子从事分裂新疆的活动。20世纪九十年代后受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和中亚分离势力的鼓舞，“东突”分裂分子在新疆境内针对中国政府和人民的暴力袭击力度逐渐增强。据统计，1990~2001年十年间，东突势力在新疆共制造了253起恐怖暴力事件，造成各民族群众、基层干部、宗教人士等162人丧生，440多人受伤。新疆的稳定引起我国政府的高度重视，开始加大打击东突恐怖主义的强度，先后消灭暴力组织和团伙503个，并通过各种渠道向土耳其政府表明中方强烈反对土政府支持东突分裂主义的立场。鉴于中国在国际社会影响力的不断提升以及支持恐怖主义对自身国家形象的负面影响，土耳其开始收缩和限制对东突势力的同情和支持。1995年土耳其总理签署密令，由于中国政府对在土耳其的维吾尔人后裔所建立的社团活动感到不安，土耳其各级公务员不得参加这些社团的各类活动和集会。2002年4月，朱镕基总理访问土耳其，埃杰维特总理强调新疆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土方已采取一些具体措施限制在土的“东突”分子从事反华活动，土政府不会支持“东突”组织的恐怖主义活动。但总的来说，土耳其对“东突”的打击和限制力度不大，态度暧昧，土部分政府官员或民间组织都是东突分裂分子的支持者或同情者。如曾担任过土总统第二秘书的土耳其少将旅长穆汗默德·热扎彼肯是“东突厥斯坦民族中心”的领导人，该组织是西亚地区影响最大的东突民族分裂主义组织。2009年新疆“七·五”事件发生后，土总理埃尔多安在没有完全搞清楚事实真相的情况下，仅仅出于“突厥民族情结”指责中国政府搞“种族屠杀”和“同化维族”，土外长为此专门与杨洁篪外长通话“表达关注”，土工业部长埃尔袞呼吁“抵制中国货”。伊斯坦布尔、安卡拉等地出现声援“东突”势力的大规模游行示威活动，有人焚烧中国国旗，当局对这些行为未加制止。^[7]

目前“东突”势力同土耳其国内各阶层已建立较为密切的联系，而土政府对“东突”不明朗的态度在一定程度上又纵容了“东突”势力在土国内影响力的扩大。“东突”问题已成为影响中土关系顺利发展的最主要绊脚石，而土耳其政府对“东突”采取什么样的政策则是解决问题的关键。

（三）地缘竞争问题。冷战结束后，中亚—高加索地带出现多个操突厥语族的独立国家，由于土耳其同这些国家在血缘、文化、宗教等方面的独特关系，土耳其一直高度重视发展同中亚国家的关系。苏联解体后，土耳其借助同该地区国家地理比邻、血缘相近、宗教相似的地缘政治优势以及俄罗斯国力衰微的有利时机，积极填补苏联留下的权力真空，大力推进“泛突厥主义”政策，一些土耳其政客甚至发出了“21世纪是突厥世纪”、“土耳其的利益区是从亚得里亚海直到中国长城”的豪言壮语。在土耳其的提议下，1992年10月首届突厥语国家首脑会议在安卡拉举行，土耳其利用血缘关系和经济援助，成功提升了在突厥语国家中的地位，成为中亚新一轮国际大博弈的主要玩家。近年来，土耳其再次加强了一度冷淡的同突厥语国家的关系，于2006年11月在土耳其召开了业已中断5年的“突厥语国家首脑会议”。在此次会议上，土耳其总理埃尔多安提出建立“突厥语国家共同体”的设想，使得此次峰会成为一个进一步发展多边合作，增进地区和平与稳定，交换彼此对有关地区和国际问题的看法，开发突厥民族的社会、文化和文化遗产的平台。^[14]面对广袤的突厥语族群，土耳其以优先于其他突厥语国家的经济、文化、科技、教育、政治制度

及社会发展水平，对突厥语世界有特殊的渗透力和影响力，被称作突厥语世界文明的中心，并以突厥语世界的领袖自居。布热津斯基也曾指出：“土耳其把自己看作是一个松散的突厥语大家庭的潜在领袖。为此它利用其令人羡慕的相对现代化的发展水平、语言上的接近以及经济手段，力图在目前这一地区的国家建设过程中把自己确立为最有影响的力量。”^[15]

中国西部与中亚地区相邻，有着长达 3000 多公里共同边界线，民族跨境同源，这决定了中国在中亚地区的地缘政治利益。因此，与中亚国家的关系直接影响到中国西部边境的安全，中国经济快速发展所带来的巨大能源和市场需求，则决定了中国在中亚地区的经济利益。所以，中国将同中亚国家的关系放到中国外交的“优先地位”^[16]，并以与中亚国家的友好合作关系为依托，以跨境同源民族作纽带，利用地缘相近的优势，争取实现在中亚地区的最大利益诉求。另外，中土在能源领域的竞争逐渐显现，未来有可能成为双方主要的地缘博弈的着力点。随着中国对能源需求的加大，中亚由于地理位置的优势在中国能源进口布局中的地位日益上升；随着中哈、中土等油气输送管线的投入使用，中国和中亚国家在能源方面的联系更加紧密。土耳其近年积极打造欧盟“南部能源走廊”，借助既比邻欧盟这一世界最大能源消费市场又紧靠中东、中亚两大能源产地的独特地缘优势，努力将自身建成连接欧亚的能源输送枢纽。土耳其继同美国合作建成 BTC 石油管线后，2007 年又同欧盟签署建设 BTE 天然气管线的协议，在这两大管线气源地的选择上同时指向中亚的土库曼斯坦和哈萨克斯坦。由于中亚国家油气供应能力有限，在供应西方为主还是东方优先问题上存在不确定性，因此中亚国家油气资源供应方向有可能成为未来中土双方潜在的博弈点。长期来看，随着土耳其东向战略的实施，中亚外交在其外交布局中的重要性不断提升，而同时中国国力的持续增强又使中国的影响力和国家利益自然向西延伸到中亚地区。因此，双方的势力从亚洲东西两端扩散，最终在中亚地区交汇，势必形成双方对中亚地缘优势上的竞争关系。

三、中土关系的未来展望

在深入回顾中土关系的历史和现状后，我们发现尽管中土关系有过阻碍、倒退，甚至发生过兵戎相见，但是和平、交流、互利却是主流，展望未来，我们有理由相信，在双方政府的共同努力下，中土关系一定会克服现实中存在的制约因素和不利局面，跃上一个新台阶。中国与土耳其关系的未来走向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以下三个方面的因素，即：政治领域的互信、经贸关系的互利以及安全利益的互惠，在这些层面上，中土两国完全有合作的基础和愿望。

（一）政治合作。中土两国都曾拥有辉煌的历史，并在近代经历面临西方冲击、抵御外强入侵的相同境遇，而当前中国和土耳其又同属崛起的发展中新兴国家，相似的国情和遭遇使两国人民在思维方式、看问题的视角、实现两国的发展目标上具有很强的相近性，对于处理国际问题也有着共同或较为接近的看法和立场。中土同为发展中国家，双方都认为在国际机构和关于全球治理改革的讨论中，发展中国家正扮演着越来越积极的角色，都主张增大包括中土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的话语权。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问题上有着共同的利益，强调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应是中土的共同立场。在地区事务上，对巴以问题和伊朗核问题，两国都主张通过外交和对话方式和平解决，在阿富汗和伊拉克重建问题上都强调发挥联合国的作用。中土同为 G20 的重要成员，双方通过在这一重要国际多边机制框架内开展沟通与合作，以推动国际社会改革旧体制，建立一个更加公正的国际新秩序，让所有的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一起分享全球发展的成果。此外，中国共产党已同包括正义与发展党在内多个土耳其重要政党建立了日益密切的友好关系，两国间的党际交往已逐渐成为推动中土关系发展的重要引擎。

(二) 经济合作。中土经贸合作始于 1965 年, 自 1974 年双方签订贸易协定以来, 双边贸易稳步上升, 目前两国贸易额已达到 140 亿美元, 中国已经成为土耳其的重要贸易伙伴之一。尽管中土经贸合作保持大幅增长势头, 但目前的经贸额还远没有反映出两国的潜力, 为此两国政府提出努力使 2015 年的双边贸易额提高到 500 亿美元。进入 21 世纪, 土耳其国内政局稳定, 经济发展进入快速上升通道, 已成为全球增长最快的经济体之一。土耳其政府制定了雄心勃勃的发展计划, 其目标是进入世界经济十强, 并成为欧亚交汇点的金融、贸易、制造和出口中心。为实现这一目标并尽早与欧洲经济接轨, 土耳其政府大力提倡加快基础设施建设, 并制定了以能源、交通和电信为重点发展方向的方针和政策。土耳其经济的迅速发展为中国同土方开展深入的经济合作提供了广阔的前景, 土政府大力进行国内基础设施建设, 为国外公司来土参与建设提供优惠政策, 而中国企业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已具备较强实力和比较优势, 为两国开展工程承包领域合作提供难得的机遇, 也是未来推动双方经济关系发展的有力增长点。其中, 中国机械进出口集团有限公司、中国铁道建筑总公司与土方公司组建联合体, 承建总金额超过 12.7 亿美元安卡拉—伊斯坦布尔高速铁路二期工程项目, 在中土经贸合作中具有里程碑式意义。两国还就共同建设横跨博斯普鲁斯海峡的第三座大桥和一些高速铁路项目展开探讨。土耳其境内风能、太阳能等资源丰富, 两国开展在能源领域合作方面有着巨大潜力。^[17]此外对中土经贸关系来说, 旅游业也存在着巨大的合作潜力。据土耳其统计署的数据, 自土耳其成为中国公民出境旅游目的地国后, 2001~2005 年, 中国公民到土耳其旅游的人数增加了 94%, 而土耳其公民赴华旅游的人数则增加了 102%^{[18]69-74}, 仅 2008 年中国公民赴土耳其旅游人数就达 6 万多人次。但相对与两国广阔的市场和丰富的旅游资源来说, 双方旅游合作的巨大空间还有待开发。随着两国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 相互了解的日益加深, 来土旅游观光的中国游客以及来华的土耳其游客人数将会进一步增长。总体来看, 中土两国间的经济关系虽然有了长足发展, 但相对来说仍滞后于两国间政治关系的发展, 未来经济合作应该是促进双边关系取得进展的最主要助推器。

(三) 安全合作。土耳其国内政府和民间同东突势力之间或明或暗的联系已成为双方领导人会谈时的重要议题, 也是中国政府在发展土耳其的双边关系时高度关注的领域, 但自“9·11”事件以来, 中土两国在反对东突分裂势力这一问题上逐步达成共识与合作意向。“9·11”事件后, 土耳其政府在伊斯兰国家中率先发表声明, 谴责恐怖主义, 支持国际社会打击恐怖主义的斗争, 土外长杰姆表示: “反对恐怖主义没有宗教信仰、地理界限和其他理由。”^{[19]256}土耳其政府积极支持反恐战争, 一方面可以为其打击国内库尔德工人党的合法性提供依据; 另一方面土耳其政府也担心中东、中亚和亚洲其他地区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对土耳其世俗政府构成主要的安全威胁。一些土耳其观察家认为, 在国内的库尔德工人党恐怖主义和分裂主义问题以及塞浦路斯问题上, 土耳其需要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支持。^[20]2010 年温家宝总理访问土耳其, 两国就合作打击极端宗教主义、恐怖主义、分裂主义“三股势力”, 共同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达成一致意见。此外, 在军事技术领域, 双方的合作正在加深, 土耳其在进行军事现代化的进程中为减少对美欧武器装备的过度依赖, 开始寻求武器来源多元化, 而中国军事装备水平的持续提高给两国在防务方面的合作提供了新的契机。目前, 中国部分先进的导弹和火炮装备已武装土耳其部队, 其优异的性能、相对低廉的价格得到土军的高度评价, 为未来双方在该领域进行更深入的合作打开了一扇窗口。

[参考文献]

[1] 世界银行.土耳其数据[EB/OL].[2009-05-26]. <http://data.worldbank.org/country/turkey>.

- [2] 马文宽. 中国瓷器与土耳其陶器的相互影响[J].故宫博物院院刊,2004(5).
- [3] 百度百科. 突厥[EB/OL].[2010-11-22].http://baike.baidu.com/view/22570.htm?fr=ala0_1_1.
- [4] 黄维民.中土关系的历史考察及评析[J].西亚非洲,2003(5).
- [5] 田曾佩.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外交[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
- [6] 咎涛.中土关系及土耳其对中国崛起的看法[J].阿拉伯世界研究,2010(4).
- [7] 董漫远.中国与土耳其关系的历史与未来[J].阿拉伯世界研究,2010(4).
- [8] 肖宪,王文章.中国与土耳其关系的演变、问题与未来[J].外交评论,2007(4).
- [9] 黄华外长会见埃杰维特总理[N].人民日报,1978-06-14.
- [10] 商务部. 中国和土耳其经济贸易合作简况[EB/OL].[2010-12-02].
<http://www.mofcom.gov.cn/aarticle/difang/ningxia/200609/20060903231506.html>.
- [11] Eyüp Ersoy. Turkey-China Political Relations[EB/OL].[2010-12-02]. <http://www.chinacircle.biz/turkey>.
- [12] 胡锦涛举行仪式欢迎土耳其总统居尔访华[EB/OL].[2009-07-20].
http://news.xinhuanet.com/photo/2009-06/25/content_11602364.htm.
- [13] 丁刚. 温家宝总理与土耳其总理埃尔多安会谈[N].人民日报,2010-10-09.
- [14] 唐志超,李荣.土耳其积极重振中亚政策[J].亚非纵横,2007(1).
- [15] 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大棋局——美国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缘战略[M].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
- [16] 邢广程.中国和新独立的中亚国家关系[M].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6.
- [17] 宫小生.稳步发展中的中土关系[N].国际商报,2009-06-24.
- [18] 露西塔·蒂罗丝,纳迪尔·伊尔梅兹.从中土关系看中国的中东政策[J].阿拉伯世界研究,2008(5).
- [19] 肖宪,等.土耳其与美国关系研究[M].北京:时事出版社,2006.
- [20] China's Kurdish Policy is Changing[N].Turkish Daily News,2006-02-28.

China and Turkey's Relation During the Forty Years: Retrospect and Prospect

DING Gong

Abstract China and Turkey have glorious contact history, especially after 1971 the two sides normalized their official relation, which symbolized the bilateral relations to enter into a new stage. Since establishing diplomatic relations, due to the influence of various factors, although the development of their relations has not been very smooth, as a whole they have got a great progress. After entering the new century, both countries march into the rising stage, both sides start to carefully examine the trend of mutual relations with standing in a view of longer angle. This article looks forward to the prospects for bilateral relations, through reviewing the history of Sino-Turkey relations and analyzing the existing questions in the bilateral relations.

Key Words Sino-Turkish Relations; Diplomatic Strategy; Great Power Diplomacy; Retrospect and Prospect; China's Middle East Policy

(责任编辑: 孙德刚)